

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时代

1916年12月26日,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委任状,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

当时的北京大学虽然建校仅18年,却是官僚气和衙门气的重灾区。教员多数出身官僚,学生则多数不学无术,一心追求仕途。然而蔡元培却对这样的北大充满了信心,他从未将北大看作是一个衙门,而是视为一个研究高等学术、培养人才的圣地。

开除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

蔡元培上任之前,北大已更换过几任校长:严复、何燏时、胡仁源,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读书人。可当时的北大是衙门学校,乌烟瘴气。来此求学的多为官僚纨绔子弟,只为混张文凭,毕业之后,靠文凭升官发财。

在校园,大家管出身官宦之家的公子叫老爷,公子们上课还带着听差,上课铃响了,仆人去叫:“请老爷上课!”上体育课,教员们喊:“老爷们右转,开步走!”下课了,老爷们就成群结队跑到妓院吃花酒、打麻将。

蔡元培刚上任没几天,教员张思秋拿来上学期的考勤记录。

“怎么缺勤的这么多啊?”

“蔡先生,这几个缺勤的我们也管不了啊!这是段祺瑞大谋士徐树铮的外甥,这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侄子!缺课的老师是英法公使亲自指派的教员克德莱!我们得罪不起呀!”

克德莱是英法公使指派的教员,他和几个外国教员不好好教课,整天钻进八大胡同的妓院喝花酒,还美其名曰“探艳团”!把校风搞得乌烟瘴气,

乱七八糟。

蔡元培当即拍案而起:“凡无学识、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,一律开缺,永不延聘!”

克德莱找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质问蔡元培,蔡元培并不买账。外交总长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信,劝他向外国人低头。蔡元培回信:“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,丝毫没有不妥。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,那就悉听尊便。”

群星璀璨,大师辈出

1917年,梁漱溟24岁,发表过几篇论文,听说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,就把论文寄给蔡先生,希望自己能够到北大读书。蔡元培约他到校长室:“你的才华可以到北大当老师。”

梁漱溟说:“蔡先生,可是我只有初中学历。”

“你可以来的,就当学术探讨交流好了。”就这样,梁漱溟到了北大任教,成为一代大师。

有一位怪学问家叫张竞生,写了本《性史》的书,把房事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做研究,被当时人们大骂伤风败俗,有辱斯文。到了蔡元培这里,就一句话:“张先生的研究蛮好的,他可以来北大教哲学。”

在蔡元培眼里,学历不重要,背景不重要,英雄不问出处,只要你是有学问的读书人,有修为,讲道德,有治学决心,就敢破格任用。在他眼里,才华是读书人的通行证,真才实学才是读书人的脸面。

当年的北大,既有陈独秀这样倡

导革新者办的《新青年》,也有以国学大师黄侃为首的守旧派办的杂志《国故》。陈独秀大谈民主、自由、解放,黄侃等人向往魏晋风流,大谈魏晋玄学。

钱玄同上课大谈白话文的推广,隔壁课堂上的黄侃骂声不绝,一堂40分钟的课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批判白话文。

胡适大力推广白话文,黄侃就对着干。有一次在课堂上,黄先生举例:“如果胡适太太死了,其家人电报一定是:‘你太太死了,赶快回来啊。’这需要用十一个字,而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:‘妻丧速归。’”

胡适听闻,立刻回击,他举例子说:“前几天,行政院邀请我做秘书,我拒绝了。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:‘才学疏浅,恐难胜任,恕不从命。用了十二个字,如果用白话文只需五个字:干不了,谢谢。’”

国学大师辜鸿铭是一位怪咖。都民国了,大清早亡了,他还穿着马褂,戴着瓜皮小帽子,留着辫子,像个腐朽不堪的前清遗老。学生取笑他,他就反击:“我的辫子是有形的,可以剪掉,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,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。”

许多学生不理解,说蔡先生不该把这样的老古董请进北大这样的学校。蔡元培回复:“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,并不是让你们学他的复辟。”

一时之间,北大群星璀璨,大师辈出,有27岁的“胡博士”胡适,有拖着辫子登北大讲台的辜鸿铭,有横眉冷对的鲁迅。这就是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”,包容不同的意见,也包容“异端”。

“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”

1915年,20岁的冯友兰从河南来到北大求学。1918年,冯友兰要办一件事,需要北大校办开证明。

时间特别紧急,照正常手续办下来,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于是他放开了胆子,直接去见蔡校长。他进了校长的院子,院子里一片寂静。校长室的门虚掩着,没有一个保卫人员,没有服务人员,也没有秘书,只有校长

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办公。

冯友兰进去说明来意,蔡先生就和蔼地说了句:“这是好事,当然要批证明书。”然后写了一个字条给他,让他拿到文学科去办。

冯友兰回忆: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,没有校长架子,穿着长衫,贵为校长,仍然是一介寒儒,书生本色,肃然物外的气象,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。

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前,北大就有招收旁听生的制度,需要旁听生支付一学期两元的旁听费。蔡先生一来,旁听制度就更加开放了。他说:“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,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。”

蔡校长来了,北大不单有正式生、旁听生,还有偷听生。这些旁听生里有作家丁玲、茅盾、沈从文、瞿秋白,靠着旁听,许多学生成为了一代大家。

有个注册的旁听生叫曹清华,他旁听俄语,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。每次说起蔡先生,他都深情地说:“没有蔡先生,就没有我的翻译之路。我是蔡先生的学生。”

北京大学马叙伦教授曾说:“蔡先生在时的北大,校园有五公开:一是课堂公开,什么人都可以来听;二是图书馆公开,什么人都可以来看;三是食堂公开,什么人都可以来吃;四是浴室公开,什么人都可以来洗;五是体育场公开,什么人都可以来玩。”

还有一次,一个叫王昆仑的北大学生问蔡校长:“我姐姐想读北大,北大招不招女学生?”

女孩上大学,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离经叛道的事,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。而蔡元培却微笑着反问了一句:“她敢不敢来?只要她敢来,我就敢收。”

就这样,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大学生。

在当时,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,如此有魄力的校长,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。

据《在裂缝中寻找微光》牛皮明/著

刘邦赴鸿门宴是项技术活

鸿门宴,指在公元前206年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(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)举行的一次宴会,参与者包括当时两支抗秦军队的领袖项羽和刘邦,因为整个过程中充满阴谋和凶险,后人也常用“鸿门宴”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。

饭局之前,作为“特邀嘉宾”的刘邦,在张良的指导下做了精心的准备。一方面,他利用“糖衣炮弹”(结为儿女亲家)把项伯搞定了,这样等于在项羽设下的饭局之中拉了个内应,这无疑为他的力挽狂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另一方面,他在赴宴人选上也费了不少神,因为是去别人的地盘赴宴,安全是第一要素,能顺利到虎穴“潇洒走一回”显然是一项技术活,因此,除了在敌人阵营中以“无间道”的方式设下内应外,自己所带的随从人员也相当重要,一句话概括就是少而精。

随从人员不宜过多,人多虽然安全系数加大,但带来的后果是,目标增大,危险系数增大。试想,呼啦啦的

一大帮人去别人阵营赴宴,且不说别人招待费神,也容易引起别人关注和怀疑,从而加强防备和警戒,这样一来,成为重点盯防对象的一大群随从无疑羊入虎口,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致命的。

刘邦显然深谙此道,因此,在选择陪同人员时只用一百骑这样少得可怜的护卫队。

人虽然少,但素质要求高,其中包含了刘邦颇为器重的“三剑客”:张良、樊哙和夏侯婴。刘邦这样选择是有讲究的,张良足智多谋,是自己的智囊;樊哙勇猛刚强,勇冠三军,是自己的保镖;而夏侯婴虽然智不及张良,勇不及樊哙,但手上却有绝活,驾马车的技术首屈一指,是自己的“专职司机”。

事实证明,刘邦少而精的战术是成功的,正是因为他在赴项羽的大局之前精心布置和打造了“小局”,最终才化危为安。

据《刘邦传:鸿门宴上的天选之人》飘雪楼主/著